

鸦片战争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同治十三年,清廷进行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此后由李鸿章、沈葆楨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光绪十一年,清廷进行了第二次海防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光绪十五年,美国的一份报告中称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9位,这也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光绪二十年,在李鸿章“保船制敌”“避战保船”的战略思想下,甲午海战以北洋舰队的惨败而告终。

晚清海权观的萌发与滞后

杨东梁

面向海洋,是近代世界强国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而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也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曾取得伟大成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受到人为的阻碍;加上明清两代推行“海禁”,使闭关自守、重陆轻海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迟迟未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才开始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

海防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1840—1842)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魏源则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更上疏清廷,阐明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岛飘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当西方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之际,中国不能自甘落后、无动于衷,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已经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不仅是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需要,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人逐步树立海洋意识的一个新突破。虽然左宗棠当时对“海洋之利”的内涵认识还比较肤浅,但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

精练海军 加强海防

在第一次“海防议”中,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从而在国防战略上确立了海洋与大陆同等重要的原则,也使海防在国防指导方针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从此以后,清廷决定由李鸿章、沈葆楨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规模初具。

“海防议”后的10年,晚清海军虽有了初步发展,但与西方列强相比,仍然差距悬殊,这一点在中法战争(1883—1884)中暴露无遗。当时,法国舰队横行东南海域,福建水师被封锁在马尾港内,全军覆没;南洋、北洋海军也无一可恃,甚至连台湾海峡都难于涉渡。

中法战后,清廷痛定思痛,急谋有所改善。光绪十一年(1885)6月发布谕旨说:“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命各沿海督抚各抒所见,这就是第二次“海防议”。第二次海防建设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其具体措施是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加强海防的整体建设。同时,决定集中使用并不宽裕的海防经费,“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支,以为之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十四年(1888)9月奏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舰艇25艘,总排水量约4万吨,再加上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海军,至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78艘,总吨位8万余吨,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海上力量。

19世纪70年代中期,晚清国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转变。这种海口重点设防思想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从海权控制来看却是消极保守的。直至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海军战略仍是“保船制敌”“避战保船”,这自然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在西方,从18世纪以后,随着海军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重视制海权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到19世纪末,美国海洋理论学家马汉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从而直接促成了德、日、美诸国海军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马汉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表述了要确保商业航运的利益,就必须获得海上航行的自由,因此必须掌握制海权。

马汉关于制海权问题的论述,引起了正积极向外扩张的日本的密切关注。日本将该书等列为军事学校、海军学校的教科书,海军军官人手一册。相反,在中国,马汉的海权理论却受到冷落,直至清朝覆亡后17年(1928),比较全面介绍海权思想的论著《海上权力论》(林子贞著)才面世,此时离甲午战争已过去了30多年。

对于海权观念,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迟迟未能觉醒,对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贸易的竞争完全处于懵懂状态,几乎一无所知。淡薄的海洋观念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漠视把清廷国防战略的制定引向了歧途,而且对我国维护海洋权力和利益的事业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北洋水师铁甲舰“定远”号

中国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主要理论来源。其时,正值日本入侵台湾,一个刚刚起步开始学习西方的东洋岛国也敢打上门来,不能不使清政府极为震惊。总理衙门认为必须积极筹措海防,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应变措施。清廷遂命沿海、沿江督抚、将军筹议,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有五位督抚大员直接引用了《防海新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本来就强调近海防御,因此,对希里哈有关近海重点防御的论述极为欣赏。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吸收了希里哈的不少见解,认为希里哈关于“聚集精锐,以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的论述“极为精切”。李鸿章倡导重点设防的攻势战略,就是直接接受《防海新论》的影响。

精练海军 加强海防

在第一次“海防议”中,左宗棠的“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观点为清政府所采纳,从而在国防战略上确立了海洋与大陆同等重要的原则,也使海防在国防指导方针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从此以后,清廷决定由李鸿章、沈葆楨分别主持北洋与南洋防务,开始成规模地筹建近代海军。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1874—1884),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规模初具。

“海防议”后的10年,晚清海军虽有了初步发展,但与西方列强相比,仍然差距悬殊,这一点在中法战争(1883—1884)中暴露无遗。当时,法国舰队横行东南海域,福建水师被封锁在马尾港内,全军覆没;南洋、北洋海军也无一可恃,甚至连台湾海峡都难于涉渡。

中法战后,清廷痛定思痛,急谋有所改善。光绪十一年(1885)6月发布谕旨说:“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并命各沿海督抚各抒所见,这就是第二次“海防议”。第二次海防建设大讨论,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其具体措施是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加强海防的整体建设。同时,决定集中使用并不宽裕的海防经费,“与其长驾远驭,难于成功,不如先练一支,以为之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光绪十四年(1888)9月奏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舰艇25艘,总

排水量约4万吨,再加上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海军,至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78艘,总吨位8万余吨,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海上力量。

19世纪70年代中期,晚清国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转变。这种海口重点设防思想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从海权控制来看却是消极保守的。直至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海军战略仍是“保船制敌”“避战保船”,这自然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在西方,从18世纪以后,随着海军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重视制海权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到19世纪末,美国海洋理论学家马汉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从而直接促成了德、日、美诸国海军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马汉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表述了要确保商业航运的利益,就必须获得海上航行的自由,因此必须掌握制海权。

马汉关于制海权问题的论述,引起了正积极向外扩张的日本的密切关注。日本将该书等列为军事学校、海军学校的教科书,海军军官人手一册。相反,在中国,马汉的海权理论却受到冷落,直至清朝覆亡后17年(1928),比较全面介绍海权思想的论著《海上权力论》(林子贞著)才面世,此时离甲午战争已过去了30多年。

对于海权观念,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迟迟未能觉醒,对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贸易的竞争完全处于懵懂状态,几乎一无所知。淡薄的海洋观念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漠视把清廷国防战略的制定引向了歧途,而且对我国维护海洋权力和利益的事业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排水量约4万吨,再加上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海军,至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78艘,总吨位8万余吨,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海上力量。

不思进取 终食恶果

中国海军力量的加强,自然引起国际上的关注。光绪十五年(1889),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富兰克林·特雷西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中国的海军实力列世界第9位,排在英、法、俄、德、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土耳其之后,而排在美国和日本之前。岂料这一海军建设的成就不但没有成为继续加强海防建设的动力,反而成了清政府不思进取的借口。从光绪十四年后,北洋海军没有再添置新的战舰。十七年(1891),户部又决定两年之内暂停购买北洋武器,海防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北洋海军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海军所抵消。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到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已拥有中等以上战舰32艘,总排水量达5.9万多吨,而且在作战的机动性和海上进攻能力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其实力已超过了中国北洋舰队,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短视与盲目终于自食苦果。

19世纪70年代中期,晚清国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转变。这种海口重点设防思想虽有一定实用价值,但从海权控制来看却是消极保守的。直至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海军战略仍是“保船制敌”“避战保船”,这自然限制了晚清海军建设的规模和发展方向。

在西方,从18世纪以后,随着海军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重视制海权的军事战略已经问世。到19世纪末,美国海洋理论学家马汉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从而直接促成了德、日、美诸国海军的崛起。光绪十六年(1890),马汉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明确表述了要确保商业航运的利益,就必须获得海上航行的自由,因此必须掌握制海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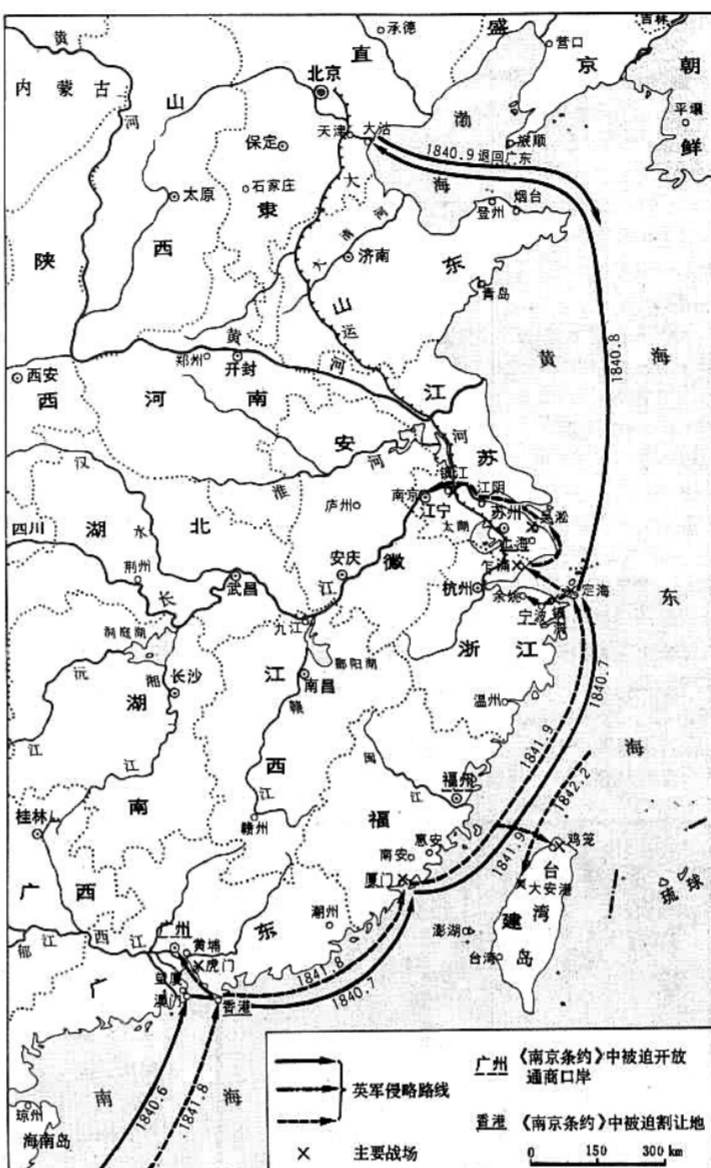
马汉关于制海权问题的论述,引起了正积极向外扩张的日本的密切关注。日本将该书等列为军事学校、海军学校的教科书,海军军官人手一册。相反,在中国,马汉的海权理论却受到冷落,直至清朝覆亡后17年(1928),比较全面介绍海权思想的论著《海上权力论》(林子贞著)才面世,此时离甲午战争已过去了30多年。

对于海权观念,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迟迟未能觉醒,对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贸易的竞争完全处于懵懂状态,几乎一无所知。淡薄的海洋观念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漠视把清廷国防战略的制定引向了歧途,而且对我国维护海洋权力和利益的事业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对于海权观念,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迟迟未能觉醒,对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贸易的竞争完全处于懵懂状态,几乎一无所知。淡薄的海洋观念以及对海洋权益的漠视把清廷国防战略的制定引向了歧途,而且对我国维护海洋权力和利益的事业造成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第一次鸦片战争海战图

■文摘

“亚洲书库”:从北京到东京

马俊杰



莫理循

如今,私人藏书已成为一种时尚,越来越多的人尝试着建立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而在百年前,北京的王府井曾有一家由澳大利亚人建立的私人图书馆——“亚洲书库”。

在王府井建图书馆的外国人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年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省,1897年作为伦敦《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来到北京,在中国工作了20多年,到过中国10余个省份,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通”。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聘请莫理循担任民国政府政治顾问。

从担任《泰晤士报》驻记者伊始,莫理循就敏锐地发现,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北京城里,除了几个私人藏书家外,还没有一家像样的图书馆,特别是自然科学书籍奇缺,这与一个文明古国的都城极不相称。于是他利用各种渠道,开始有计划地、系统地搜集图书,仅几年时间,就在位于王府井的皇亲溥伦的府宅里建成了自己的图书馆。图书馆建成后,被

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经营图书馆可谓用心良苦,当时有许多图书价格很高,莫理循有时要欠债购买这些图书。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书库的规模越来越大,声誉也越来越高,其中收藏的书籍、文献、史料达2.4万余册,还有110多种报刊以及1000多种图册和图片资料。这些图书来自中、英、法、德、俄、荷、意等十几个国家,内容不仅涉及中国,还涉及中亚诸国、日本、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等国家,门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历史、地理、文学、法律、美术、地质、矿物、医药、娱乐等,对当时的学者深入研究亚洲帮助很大,“亚洲书库”也因此而得名。

莫理循并没有垄断这些精神财富,他十分欢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亚洲书库”来阅读,也接纳欧美学者来此从事东方研究。一些外国来访者受益匪浅,回国后在媒体上大力推介该书库,使莫理循及其“亚洲书库”名扬海外。

磨难中保存至今

1916年6月,袁世凯在唾骂声中死去,莫理循又先后效力于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于是想返回英国治病,但“亚洲书库”却令他割舍不下。经过一番考虑,莫理循决定将“亚洲书库”出让,表示愿意将书库卖给中国政府、学术团体或个人。但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安,忙于争权夺势的北洋政府里根本无人关心和重视文化事业,而有识之士又苦于囊中羞涩,无力购买。消息传到美国,各名牌大学深知“亚洲书库”的价值,纷纷联系收购。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表现得最为积极,争相报价,加州大学的报价高达3.5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然而,莫理循最大的愿望是将书库留在中国,最低限度也要留在亚洲,于是他在出让

古代两军交战,为了抵御敌军刀剑及箭镞对身体的伤害,士兵们往往会上甲衣或手执盾牌进行防护。甲衣一般都是用铁片串连而成的,不过,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竟然还有用纸做成的甲衣。

南宋真德秀任泉州知州时,上枢密院的奏折称:“所有本寨军器都稍足备,但水军所需者纸甲。今本寨乃有铁甲百副,今当存留其半,而以五十副就本军换易纸甲。”(《真文忠公文集·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在今人看来,用纸甲防御刀剑箭镞很不可思议,但从真德秀的奏折来看,纸甲的防御能力还要优于铁甲。

纸甲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用于军事,此后一直沿用至清代,不曾间断。《南史·齐本纪》云:东昏侯时,北魏兵压境,(帝)乃聚兵为固守计,召王侯分置尚书都坐及殿省。尚书旧事,悉充纸铠。“纸铠”,即用以护身的纸甲。唐宣宗时,徐商守蒲州,有兵士千人,“装纸为铠,劲矢不能透。”(《新唐书》卷113)这种纸质铠甲,竟然连箭都射不穿,足见其柔韧和安全。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与后周交战,“民间又有自相率,以纸为甲、武器为兵器,号白甲兵。”(《南唐书》卷三)

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牙手”。一次性制造和分发3万件纸甲,可见这种装备已经是当时的正式装备。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在记载了这一内容后,又有“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账籍制造”。可见,宋代的纸甲是用陈年账簿的纸张制造的。时任

贵州省凤冈县双山乡田家寨村的青杠坝发现了一件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纸甲实物,可见纸甲直到晚清依然在战争中使用。

陕西西略安托使的田况也说:“臣前通判江宁府,因造纸甲得远年账籍。”(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

明军抗击倭寇时,也使用了纸甲。至于为什么弃铁甲而用纸甲,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总结道:“(南方)天雨地湿,铁甲易生金肱,必不可用矣。倭夷土贼率用火銃神器,而甲有藤有角,皆可用。但铅子俱能洞入,且体重难久。今择其利者,步兵兵有鞞甲,用鞞布不等。若纸绵俱薄,则箭亦可入,无论铅子。今需厚一寸用绵密鞞,可长至膝。”可见,纸甲并非完全用纸,而是用纸和丝帛等物混合制作而成,并且厚度达一寸。明代杨国桢在《涌幢小品》中也记载了纸甲的制作方法:“纸甲,用无性板柔之纸,加工捶软,透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雨水浸透,犹箭难透。”陈氏所说的“无性板柔之纸”不知是何纸,但可以看出它极柔韧,透厚三四寸后再用铁钉固定。

2004年11月,贵州省凤冈县双山乡田家寨村的青杠坝发现了一件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纸甲实物,可见纸甲直到晚清依然在战争中使用。



已,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又对书库进行了补充,先后购进涉及中国、日本、中亚、波斯、印度以及南洋诸国的图书近5万册,还从日本记者渡边哲信手里征集到清末民初3.5万英镑的高价收购。岩崎的父亲素来珍视东方文化,特别钟情于中国史籍,曾高价收购过中国旧藏珍籍,他以中国宋、元图书为建立“静嘉堂文库”,藏书达25万册。

“中国书库”的藏书从北京由铁路运往天津大沽,从大沽装上“高砂丸”号邮船,1918年9月运抵日本横滨。但是,藏书刚刚搬到日本就遭遇了一场灾难。1918年9月,暴风雨袭击了日本深川,临时存放图书的位于深川的岩崎别墅遭到水淹,大部分图书被海水浸泡。岩崎召集各路专家进行紧急抢救,经过洗涤、干燥、改装等多道工序,大部分图书得以复原,但仍然有一部分图书无法修复,只能丢弃。

巨大的损失令岩崎痛心不已,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又对书库进行了补充,先后购进涉及中国、日本、中亚、波斯、印度以及南洋诸国的图书近5万册,还从日本记者渡边哲信手里征集到清末民初3.5万英镑的高价收购。岩崎的父亲素来珍视东方文化,特别钟情于中国史籍,曾高价收购过中国旧藏珍籍,他以中国宋、元图书为建立“静嘉堂文库”,藏书达25万册。

“中国书库”的藏书从北京由铁路运往天津大沽,从大沽装上“高砂丸”号邮船,1918年9月运抵日本横滨。但是,藏书刚刚搬到日本就遭遇了一场灾难。1918年9月,暴风雨袭击了日本深川,临时存放图书的位于深川的岩崎别墅遭到水淹,大部分图书被海水浸泡。岩崎召集各路专家进行紧急抢救,经过洗涤、干燥、改装等多道工序,大部分图书得以复原,但仍然有一部分图书无法修复,只能丢弃。



“亚洲书库”一角